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多元文化凝聚一体赓续中华文脉

□ 萨仁高娃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多元文化凝聚一体，形成中华文明宝库中一颗颗璀璨明珠，构筑中华民族五彩斑斓的共有精神家园。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以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彰显其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

习近平总书记多个场合提出“自古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从未中断过的文明，是人类历史上“连续性文明”的典范，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人文蕴涵。从古老的甲骨卜辞、钟鼎金文、简册帛书，到手抄印刷的书籍手卷、线装书册，历史悠久、卷帙浩繁的中华典籍，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精神、文化，更蕴含着生生不息的力量。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魏晋南北朝时期，沿着丝绸之路延绵，文字传播与文化交流在地处要冲地带的于阗（今和田）和鄯善（今若羌一带）十分活跃，来源于阿拉米字母的佉卢字，在王国上层广泛使用，公元2世纪的佉卢字《法句经》，即目前所见我国境内最早的民族文字古籍。古代西域，纸张稀缺，佉卢字文献多见木牍等古老形制，丰富了我国书籍载体。源自阿拉米字母的还有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蒙古文、满文，一脉相承，镌刻、书写和印刷的古籍文献汗牛充栋。

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雅鲁藏布江横贯西藏南部，绕过喜马拉雅，带着雪域文明与印度文化相连，源自印度婆罗米字母的焉耆—龟兹文、于阗文、藏文、傣文、八思巴字，无不散发着南北文化交流的光芒。约成书于5—6世纪的焉耆—龟兹文剧本《弥勒会见记》，长达27幕，被称作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剧本。随着历史的发展，到6世纪，于阗地区于阗文和汉文并用，汉字影响逐渐扩大。至唐代，于阗作为安西四镇之一，直接受唐朝管辖，中原文化影响至深且巨，所存汉文与于阗文对照名目、汉文与于阗文对照木简等，均是有力证据。于阗文长卷末尾赫然落款硕大的汉字“敕”，接受中原文化可见一斑。

唐代，疆域辽阔，开放包容的政治文化思想促使民族交往与交流频仍。漠北的突厥、回鹘，青藏高原的吐蕃，与唐朝关系密切，汲取中原文化养分，滋润着本民族文化土壤。毗伽可汗是后突厥第三任可汗，与唐朝关系和睦，遥尊玄宗为父，多次请求和亲和通市。唐朝在西受降城（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乌加河乡的库伦补隆村）与突厥互市，每年交易帛数十万匹。阙特勤是毗伽可汗弟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1）去世，其兄于次年立碑纪念他的功勋，唐玄宗亦派人参加立碑，并在一面用汉文记述唐朝与突厥民族的友好关系。此事，新旧《唐书》均有记载。见证唐朝中央与草原突厥民族之间友好往来的此碑和唐玄宗所立石像，蒙古太宗时期，在耶律楚才之子耶律铸的《双溪醉隐集》中继续得到歌颂与赞扬。

唐玄宗给草原民族带去的石刻文化，深受当地喜爱，后毗伽可汗及其岳父噶欲谷死后，亦立碑刻石，形成突厥三大碑。立碑记事成一时之风，突厥文文献亦以石刻文献留存者多。接替突厥，在蒙古高原兴起的回鹘民族，继续与唐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保持友好往来，每位回鹘可汗均接受唐朝册封，唐朝先后有四位公主嫁给回鹘可汗。回鹘曾助唐平定安史之乱，抵御吐蕃对西域的进攻。唐武宗会昌二年（842），首领嗢没斯率部归唐。会昌三年，宰相崔铉撰文、柳公权书的《皇帝巡幸左神策军圣德碑》（简称《神策军碑》），即记录了回鹘灭亡与嗢没斯归唐之事，与突厥《阙特勤碑》遥相呼应。

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与唐王朝加强往来，不断吸纳中原文化精髓。文成公主远嫁吐蕃，为雪域高原播撒了中原文明的种子。吐蕃占领敦煌时期（786—848），中原文化与吐蕃雪域文明亲密接触，汉文书籍写本时代的典型装帧形式卷轴装广泛被吐蕃人接纳。吐蕃人法成久居敦煌，翻译和注解诸多汉藏文佛经，堪称唐代传播汉藏文化使者。敦煌地区流行的汉藏文佛经，既有藏人抄写，也有汉人抄写，可谓民族融合达到了鼎盛。藏经洞出土吐蕃文经卷80个包中不乏反映吐蕃与中原文化交流交融的珍贵文献，如，吐蕃文音译汉文内容、汉吐蕃文对照词汇、千字文习字、吐蕃文翻译儒家经典、吐蕃文翻译《太公家教》等，无不浸透着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而唐长庆三年（823）唐朝和吐蕃为纪念长庆元年双方会盟成功而立的《唐蕃会盟碑》，用汉、藏两种文字镌刻，不仅是历史上汉藏友好关系的象征，对于唐蕃关系史乃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历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此碑如今立在拉萨大昭寺广场，宣示着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的史实依据。

凡树有根，方能生发；凡水有源，方能奔涌。宋代，随水草丰美而迁徙的北方游牧民族异常活跃。黄河中游，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吸纳中原文化诸多元素，脱胎于汉字的西夏文活生生保持汉字从甲骨文起其从上而下、从右向左刻写的形态，装帧多为同时期汉文古籍常见的经折装、蝴蝶装。西夏出版业的格外发达，亦不无与宋朝十分成熟的雕版印刷有关，甚至汉字活字印刷术，被西夏有效借鉴利用，用其印制的西夏文古籍实物流传到我们这一代，从藏文翻译成西夏文的蝴蝶装《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其典型。西夏与西藏的密切关系以及相关帝师制度等沿袭至元代。西夏时期刊刻的藏文《顶髻尊胜相总持功依经录》等，是藏文刻本的早期实物。西夏还翻译《论语》《孟子》《孝经》等儒家经典以及《孙子兵法》等兵书，西夏文《天盛律令》从形式到内容都接受了中原王朝《唐律疏议》《宋刑统》等成熟的法律文献。而黑水城出土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作为汉、西夏文合璧词典，为解开神秘的西夏文起到了关键作用。其前，发祥于西喇木伦河和老哈河一带的契丹民族亦借用汉字创制契丹文，多以石刻文献保留至今，仍延续汉文固有的书写模式。与之相同者还有东北白山黑水间形成的女真文，依旧保持着汉文书写特征。至宋代，回鹘人继续维持与中原王朝的密切关系，文化上吸收，文明上融合，10世纪用回鹘文翻译《大唐三藏法师传》，使本传中详细记录的西域诸事通过本民族文字广为传播。相继兴起的蒙古民族亦不甘示弱，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期间邀请长春真人丘处机前往，意在“返朴还淳，去奢从俭”，了解和学习汉地文化。长春真人不辞辛苦前往西域，向成吉思汗灌输道教精髓，由此1228年形成著名的《长春真人西游记》。石刻文化延续到蒙古地区，1225年，西征归来的成吉思汗在大草原立回鹘式蒙古文《移相哥碑》，成为蒙古文最早文献。蒙古时期，也刊刻了诸多汉文典籍，如《孔氏祖庭广记》《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太清风露经》《歌诗编》《重修政和经史证

类备用本草》等，无疑为我国书籍雕版史锦上添花。蒙古时期，与西藏关系更加密切，1247年，窝阔台汗次子阔端王将西藏萨迦派四祖贡噶坚赞邀请至凉州会晤，为西藏纳入元朝统一中央政权做出了巨大贡献。南方，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写本佛经，汉文旁标注白文音，意在白族地区能够诵读和推广汉文经典。

元朝，取《易经》的“大哉乾元”，以“大元”称国号，定都大都，拓展疆域，全面接受中原文化，多民族文化继续实现大融合，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孝经》《毛诗》《尚书》《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帝范》《百家姓》等汉文经典译成蒙古文本，滋养一批蒙古族文士，汉文化在蒙古人中的传播更为广泛和深入。在大都，使用雕版技术印刷的藏文因明学著作传入西藏，文明之母在雪域高原扎根，为其后藏文刻本的流行奠定了基础。藏文元刻残叶还发现于敦煌莫高窟北区59窟，可见其传播之广。藏族著名格言诗《萨迦格言》被译成蒙古文，为蒙古族教育领域带来极大影响，其八思巴文刻本残叶，亦发现于敦煌莫高窟北区。石刻文献继续盛行，多文种合璧为其一大特征，汉文和回鹘式蒙古文合璧、汉文和八思巴字合璧者为多，元至正五年（1345）所立《云台券门浮雕》，则以梵文、藏文、八思巴蒙古文、回鹘文、西夏文、汉文（汉文音译梵文、汉文翻译）组成，以及元至正八年所立六体合璧的《莫高窟造像记》，无不充盈着民族文字的互动与民族文化的交融。元代，西夏文刻经继续得到发展，杭州等地作为刻书中心刊刻西夏文大藏经，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随着南传佛教的传入，借自婆罗米字母的傣文在傣族地区流行，用其刻写的傣文贝叶经，再次丰富我国书籍文化载体，而其纸质文献用当地手工技艺制造，极具特色。

明代，有效管理边疆民族地区。明初，为了解统治区域内的民族语言，编纂多文种合璧《华夷译语》，各语言间形成互学并进。将蒙古族的《蒙古秘史》用汉字拼写，成《元朝秘史》，并于洪武年间刊刻，永乐时期编纂《永乐大典》又将其全文收入，使这一蒙古族首部书面文献成为不朽之作。云南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地缘处于汉藏族群交汇区域，经济、文化上均保持交融、交往关系，政治上隶属并服从于明朝中央政府。永乐八年（1409），永乐皇帝组织刊刻和朱印藏文《甘珠尔》，护送至拉萨，是今留存于布达拉宫的唯一一部举世瞩目的珍品。明万历时期，继续刊刻藏文《甘珠尔》，丽江木氏土司继承这一传统，刊刻丽江版，成就藏区刊刻的首部《甘珠尔》，初印本送至西藏，拉萨大昭寺所藏本以其完整和保持原貌的特性，令人赞叹。永乐九年，永乐帝敕命刊刻的经折装《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开本巧小，用纸考究，前后有永乐帝汉文序和藏文翻译序，进一步书写汉藏文化的交往交融。彝族，历史悠久，文字自源，明代将汉文《太上感应篇》编译成彝文《劝善经》，并刊刻行世，成就彝文古籍唯一的刻本。彝族史学著作《六部经书》在明代也得到抄写流传。藏区，雕版印刷得到普及，所刊刻的著名医学著作《四部医典》，作为最早刻本，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明宣德六年（1431）刻《诸佛菩萨世尊妙相名号》，前有汉文、藏文、梵文、蒙古文序，所收部分内容亦梵文、藏文、汉文、蒙古文合璧，将多文种合璧文化介质再次推向高潮。明代的部分石刻，或为藏文，或为汉藏文合璧，昭示汉藏文化的紧密关系。保持图画形态的东巴文，比甲骨文更加形象，堪称象形文的“活化石”，2003年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清代，极度注重与汉文化和周边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乾隆帝精通满文外，还精汉文、藏文、蒙古文，其第六子永瑤亦不例外。清代所编纂的《钦定西域同文志》，是以满、汉、蒙、藏、维、托忒文合璧的辞书，专门搜集西北地区人名、地名，并加注音注释，无疑是为

了了解和推进各民族关系。不同时期编纂的《满文全字十二字头》以汉音拼写满文十二字头及其形成的字系，努力将汉文推广到满族人士中。《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则主要以汉音和满文音拼写当朝人名、地名等固定称谓，力争制定标准，规范民族文献同音不同写法的分散现象。系统记录清朝诸事的《清实录》，分别以汉文、满文、蒙古文问世，展现清统治者将多元文化凝聚一体的魄力。有清一代，多部汉文典籍被翻译成满文，内容包括四书五经、语言文学、历史地理、医学艺术、军事法律等诸领域，包罗万象，甚至《几何原本》等西洋科学著作被译成满文本，成为满文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单满文的，也有多文种合璧者，多见的有满、汉文合璧，满、汉、蒙古文合璧，满文、汉文、藏文、蒙古文合璧者，永瑆用四种文字抄写的《二十一救度佛母赞》为其纸质文献典型。清代，蒙古族《蒙古源流》被译成满、汉文本，使该史书的流传范围极其扩大，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迎来了纵横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盛世。仿汉文篆书而形成的满文三十二体篆字，形似飞舞的“龙”，以满汉文篆体对照刊刻的乾隆《御制盛京赋》美观大方，艺术价值极高。众多四体合璧石刻文献中，乾隆时期敕立的汉、满、藏、蒙古文合璧《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碑，记载新疆土尔扈特蒙古部落坚决脱离沙俄统治，历经千难回到祖国怀抱的悲壮历史事件，歌颂土尔扈特人的家国情怀。清代，经康雍乾三朝的藩乱平定，境内局势趋于稳定，勘测疆域，绘制舆图得到重视。清初舆图，如康熙年间绘制的《皇舆全览图》、雍正年间绘制的《皇舆十排全图》，以满汉文标注为著称。乾隆时期，亦见有满文地图，乾隆十九年（1754）其第二次巡幸盛京时所彩绘线路图，所驻跸之处均用满文标注，形成满文地图中一大特色。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五台山圣境全图》，有汉、藏、蒙古文题诗，歌颂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全图在寺庙、宝塔、树木、溪水间以康熙帝巡幸五台山的行迹为主线，中间穿插康熙射虎、康熙射圣、老人示路等风趣生动故事。组织刊刻者是大库伦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弟子、庆宁寺桑噶埃玛克的那木喀。汉、藏、蒙古文化元素在此图中得到集中反映，可称作民族文化交流交融之典范。南方，图画、符号和汉字为一体形成的水书，仍保持汉文书写方向，所留下的历法文献独具特色。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民族问题、民族工作，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的党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理念，鲜明提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中华文明重要载体的古籍，以其真实的记录传唱着祖国多元文明凝聚一体赓续中华文脉，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趋势，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有信心也有决心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